

【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隋唐洛阳粟特移民分析

张玉霞

摘要:隋唐时期的洛阳生活着大量粟特移民,其来源或是汉魏南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的后裔,或是隋唐时期入华的粟特人。商业利益的驱使是粟特人移民洛阳的根本原因。生活在洛阳的粟特移民身份包括商人、宦宦、僧侣、奴仆等,其中官员以武职为主。他们在洛阳的居住比较分散,但在南市周边相对集中。唐代中期以后,洛阳的粟特移民加速了汉化的进程,在与汉族通婚、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终与汉族无异。

关键词:隋唐时期;洛阳;粟特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139-07

粟特地区也称为河中地区,指中亚以泽拉夫善河为中心、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广阔地域,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居住着大量粟特移民。洛阳近年来不断出土粟特人的墓志及石刻资料,向达、李健超、刘铭恕、卢兆荫、毛阳光、福岛惠等先后以此为主要依据,探讨了隋唐洛阳粟特移民的居住、婚姻等情况,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突出贡献。^①而关于隋唐洛阳粟特移民的其他问题,比如他们的身份、他们迁移进入洛阳的路径与过程、他们在洛阳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向等相关研究仍比较薄弱。文章不揣浅陋,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一、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来源

粟特人与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可以上溯至公元前5世纪,官方之间的往来始自汉代张骞、班超交通西域之后,隋唐时期粟特人开始大规模移民中原,洛阳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之一。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以下两部分。

其一是汉魏南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的后裔。粟特地区第一次主动遣使入汉是成帝时:“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②西域都护郭舜分析康居遣子入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好汉朝,而是“欲贾市”。

实际上应该是二者兼具。西汉朝廷考虑到经营西域的实际需要,也为了“重致远人”、宣扬国威,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最终还是接受了康居侍子。^③康居此后“终羁縻而未绝”^④。粟特人开始频繁进入中原来到洛阳始于东汉时期,“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⑤。来到洛阳的粟特人不仅是商人,还有僧侣,“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⑥。敦煌文书中的粟特文Ⅱ号信札也曾提及西晋时期粟特商人在洛阳的情况。但汉晋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数量,史籍中却无迹可寻,可能并不是很多。汉晋以降,粟特人持续不断来到洛阳^⑦。康居、月氏等粟特地区国家在汉代之后仍向曹魏纳贡:“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⑧西晋时,康居先后于泰始三年(267)^⑨、太康八年(287)^⑩遣使、献马。北魏时,粟特地区分化出悉万斤、粟特、迷密、者舌、伽秀沙尼、比地等诸多小国,粟特地区众国多向北魏遣使贡献通商,“访问当时的平城、洛阳和长安等地,双方关系十分融洽”^⑪。这为粟特人大批入华提供了便利,“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⑫迨至北魏时的洛阳,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商

收稿日期:2019-11-29

作者简介:张玉霞,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450002)。

移民已有万余家。“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⑬除洛阳外,北魏时期高昌、敦煌、凉州、姑臧等地都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并已形成聚落,^⑭华北地区的长安、灵州、营州等地交通线附近也有粟特人聚落。^⑮

其二是隋唐时期入华的粟特人。隋唐时期粟特地区昭武九姓国人大批涌入中原,移民洛阳。隋大业年间曹国、安国、何国、史国、康国等昭武诸国曾频繁遣使贡献方物。隋炀帝在洛阳设市,鼓励贸易并命裴矩“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⑯。唐代时粟特地区一度成为唐朝的羁縻府州,大量粟特人因之入华,丝绸之路上的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玄奘曾描述河西走廊“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⑰。唐代粟特人向中原最重要的一次移民发生在贞观四年(630)前后,唐军大破东突厥后,优待降者,“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⑱。唐王朝于幽州至灵州间设州安置包括大量粟特人在内的突厥降部。灵夏南境的鲁州、含州、丽州、依州、塞州、契州等“六胡州”中安置的粟特人约有 8 万人。^⑲开元九年(721)康待宾率六胡州粟特人起事,有众 7 万。次年失败后,唐朝廷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⑳。伴随着此次移民,大量的粟特人来到洛阳,这在洛阳出土的墓志中也有反映。如景龙三年(709)《安菩墓志》载安菩父亲原是安国大首领,东突厥灭亡后率衙帐百姓归中国,被封为定远将军,安菩本人作战英勇,袭定远将军爵,“领衙帐百姓,献职西京”^㉑。尽管没有数据能够说明隋唐时期洛阳居住粟特人的具体数目,但毫无疑问当时洛阳居住的粟特人一定比北魏时期更多。洛阳城内有袄祠、大秦寺、摩尼寺等与粟特人相关的宗教寺院多所,龙门石窟有多处粟特人题记,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据统计多达 60 方^㉒等等均可佐证。

洛阳出土的隋唐时期粟特人墓志也显示,洛阳粟特移民主要是汉魏北朝以来入洛粟特人的后裔以及隋唐时期入洛的粟特人。有多方墓志载墓主祖上早在北魏时即已迁居洛阳的,如唐高宗上元元年

(674)《康婆墓志》载其祖上是北魏时进入洛阳的:“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㉓隋开皇九年(589)《安备墓志》^㉔、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安静墓志》^㉕和《康子相墓志》^㉖也均载其家族于北魏时进入洛阳。而睿宗垂拱三年(687)《康敦墓志》将其家族进入洛阳的时间上溯至西晋时期^㉗,高宗龙朔三年(663)《安师墓志》、总章二年(669)《康达墓志》、中宗神龙元年(705)《安令节墓志》则均将其家族进入洛阳的时间上溯至东汉时。^㉘唐代进入洛阳的粟特人,还有高宗永徽四年(653)《安延墓志》、永淳元年(682)《康留买墓志》^㉙,玄宗开元七年《史多墓志》^㉚、天宝九载(750)《康仙昂墓志》,德宗贞元十八年(802)《何澄墓志》^㉛等,多方墓志均载其墓主于唐时迁居洛阳。武周长寿二年(693)《安怀墓志》则载其祖上于隋朝入洛,“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㉜。

二、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产生的原因及移民路径

隋唐时期洛阳聚集着大量粟特移民,其迁移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商业利益的驱使是根本原因。粟特人以经商著名,“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㉝。玄奘也认为粟特人“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㉞。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与长安一样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为全国交通枢纽、漕运中心和物资转运中心,其地位在隋炀帝时期、武周时期一度超越长安,大量的异域部落首领内附、人质和入贡于此。自隋炀帝在洛阳设市,大力鼓励贸易始,域外商贩们便纷至沓来进行贸易。北市、南市与西市内有百行千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粟特人在洛阳的商业活动也随之频繁起来,由于洛阳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丰富商品,面对整个唐帝国的广阔市场,粟特商人不必长途跋涉也能得到丰厚利润,这吸引着粟特人在洛阳定居。经商和移民向来是商业民族两个最重要的特点,“而粟特人的移民与商业活动的关系,表现出更为密切的关系,商业活动促进了移民,而移民又进一步带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㉟。

其次,开放的环境与便利的政策是隋唐时期粟特人大量移民洛阳的重要原因。北魏隋唐时期对于外来民族、文化均十分包容。天宝以后,年轻人爱慕

少数民族风俗,长安东城老父惊呼“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③⑥}。东都洛阳与长安一样,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盛行,诗人王建《凉州行》中有言“洛阳家家学胡乐”,少数民族文化的盛行,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壁垒早已荡然无存,这种氛围吸引着粟特人定居下来。隋唐时期国家能够实施有效统治,使国内交通顺畅,既无层层关卡,更少盗贼滋扰,尤其在粟特地区成为唐王朝的羁縻府州后,粟特商人入境的手续大为简化,不需要入境检查,仅需在当地州县申请过所即可入境,入境后可以跟唐朝百姓一样进入内地贸易。这样便利的跨国行动,促使更多的粟特人移民洛阳经商定居。申请过所的具体情况在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发现。吐鲁番文书中共有 10 件公验过所文书,申请者共 27 人,商贾占 70%,其中粟特商人有 14 人,约占 51%。^{③⑦}若发生商业纠纷,粟特商人可以遵循唐律向当地政府起诉寻求裁决。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③⑧}地方政府审理案件的个案,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记载。《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就记录了地方政府审理粟特商人曹禄山兄弟与汉族商人李绍谨商业纠纷案的全过程。^{③⑨}开放的环境、便利的政策,以及唐政府对粟特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促进了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粟特人移民中原的进程。

再次,突厥和唐朝先后对粟特本土的统治,是隋唐时期粟特移民中原及洛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6 世纪中叶至 7 世纪中叶,粟特地区一直处于突厥的控制之下。粟特与突厥王族之间本就通婚^{④①},在突厥的粟特人也与突厥通婚,且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比如《康金吾神道碑》载:粟特人康阿义屈达干出身于“北蕃十二姓之贵种”,祖孙几代都与突厥阿史那汗族通婚、累任要职,“祖染,可汗驸马,都知兵马使”,其子没野波以阿史那氏为妻。^{④②}安禄山也曾自称“我父胡,母突厥”^{④③}。粟特人在突厥以部落的形式存在,控制着大部分突厥与中原的绢马贸易,^{④④}突厥人获得的大量丝绸也主要是经由粟特人销往罗马、波斯。^{④⑤}这一时期,粟特往往是先进入突厥,再与中原贸易。比如突厥对隋炀帝雁门之围的直接原因,就是隋炀帝派裴矩引诱被始毕可汗所宠任的粟特人史蜀胡悉至马邑互市,史蜀胡悉因“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④⑥}而被杀。突厥与

隋唐的官方交往中也有粟特人的身影,唐以粟特人为使出使突厥,如太宗贞观四年以唐俭为使、粟特人安修仁为副使出使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二十年命安修仁长子安永寿出使铁勒诸部。^{④⑦}7 世纪中叶唐军大破突厥后,数以万计的粟特人随突厥降部一起进入中原。在粟特地区成为唐王朝的羁縻府州后,粟特商人更加积极入境来到内地。

最后,8 世纪上半叶之后,昭武诸国的频繁入贡与阿拉伯帝国的东向扩张,也使粟特人大量移民进入中原地区。707 年至 713 年,大食相继大破安、康、米、史、何、石等中亚诸国,之后阿拉伯人东进的脚步并未停止,从诸国进贡唐朝的表文中亦可知悉,如开元七年安国国王的表文中说:“从比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同一年康国王也进贡表迫切希望唐朝出兵抗击大食:“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④⑧}开元二十九年石国在贡表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愿望:“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得大石,诸国自然安帖。”^{④⑨}天宝十载唐在与大食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中失败,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粟特地区逐渐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这成为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的重要原因。^{④⑩}

隋唐时期粟特移民移居洛阳的路径大体上是循着丝绸之路而来,商路沿线分布着一系列粟特人聚落。^{⑤①}粟特人进入洛阳,主要从两个方向。一是从西域北道或南道进入并通过河西走廊,向东南经原州进入长安、洛阳,从洛阳向北经卫州、相州可达幽州、营州。这条线路,文献和墓志中均有迹可循。文献载安氏“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⑤②}。《安令节墓志》载: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⑤③}。二是出河西走廊后向东北经灵州、并州,穿越太行诸陁可至幽州(治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由此再南向进入洛阳。

太原、洛阳间的驿道至少从北魏开始已十分繁荣,唐代宗即位时回鹘军队^{⑤④}以及前文述及的 630

年前后的那次重要的移民均是沿这条线路。安禄山也盘踞在这条商路上,获得大量资财:“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⑤4}两个方向道路网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聚居有粟特人,至今留有粟特人的遗迹。据研究,骆驼袄神的形象便诞生于通往洛阳的道路网上,^{⑤5}河朔地区更是聚居着大量粟特人^{⑤6}。又比如恒州获鹿地当由幽州进入洛阳的孔道,获鹿曾有粟特人信奉的袄祠,有宝历二年(826)所立碑碣^{⑤7},也遗留有唐代粟特人造的经幢^{⑤8}。唐代粟特墓志中也见有称墓主是并州太原、相州安阳等地人。如高宗咸亨三年(672)《康武通墓志》、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安孝臣墓志》等称墓主为太原人,^{⑤9}咸亨四年《康元敬墓志》^{⑥0}等称墓主为安阳人。纵观有唐一代粟特人墓志中述及的活动区域,也“大致呈现由西向东的发展趋势”^{⑥1}。

三、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身份及居住状态

隋唐时期生活在洛阳的粟特移民身份十分多样,有商人、官员、僧侣、艺伎、奴仆等等,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

商人的数量相当大。隋唐时期粟特商队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经济组织,他们操纵了农牧民族间及中原转销大食、拜占庭等地的贸易。洛阳的粟特商人,涉足洛阳至西安两京之间,以及洛阳至河朔、漠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的商道,不乏富商大贾。如《康婆墓志》载康婆“世袭衣纓,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招延宾口,门多轩盖。锦衣珠服,入必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⑥2}。垂拱三年《康老师墓志》载康老师:“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缓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何曾侈糜,不能逾一万之钱;刘毅雄豪,不能多百万之费。”^{⑥3}墓志记述或许夸张,仍能看出康婆、康老师等粟特商人不仅因贸易而富甲一方,而且多结交王孙贵族。粟特商人也捐刻造像供养。龙门石窟保存的造像题记中,卢舍那大佛南侧北市丝行像窟(编号 1504)题记中有粟特商人康玄智题名^{⑥4};古阳洞北与药方洞之间北市香行像窟(编号 1410)北壁东端上部有一方永昌元年(689)题记,供养人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社人史玄策、康惠澄、何难迪、康静智等粟特商人名字。^{⑥5}

仕宦也有相当数量,且以武职为主。隋唐时期

入华粟特人通过归附、使节、人质等途径入仕的有很多。^{⑥6}比如石国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之弟仆罗于神龙元年(705)来到洛阳,被授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⑥7}有学者详细分析了 22 合唐代粟特人墓志,发现任武职或与之相关的多达 15 人。^{⑥8}这在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中也有反映。比如上文言及的安善父子均获封定远将军,安师“曾祖哲,齐任武贲郎将;祖仁,隋任右武卫鹰扬;父豹,隋任骁果校尉;(君)文武兼资,名行双美”,“夫人康氏,隋三川府鹰扬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康达“曾祖助,齐任上柱国;祖连,齐任雁门郡上仪同;父洛,隋任许州通远府鹰击郎将;(君)文武兼资,名行双美”。康留买“曾祖感,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国”,“诏授(公)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果毅北门长上”。留买兄弟康磨伽“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授游击将军上柱国”。又比如调露元年(679)《康续墓志》:“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君)授平州平夷戍主。”^{⑥8}8 世纪以后粟特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比如参与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平定朱泚之乱等,《史然墓志》载:“公属朱泚作乱,立志节,遂封为定难功臣。”“文武官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兼试太常卿,封建康郡开国公。”^{⑦0}上述志文中述及的定远将军、武贲郎将、武卫鹰扬、骁果校尉、都督、鹰击郎将、果毅、游击将军、卫翊卫、金吾卫大将军等等均是武职。迨至五代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粟特人仍大部分为骁勇武将。武职之外,粟特人也出任文职。比如隋炀帝征高丽时造辽水桥并制行殿及六合城的将作少匠何稠^{⑦1},武后时在太常工籍的安全藏^{⑦2},开元二十五年在东都将明堂改建为乾元殿的将作大匠康誓素^{⑦3}等。

粟特的佛教僧侣也来到洛阳传教,他们“志传像法,不吝乡邦。杖锡孤征,来臻中夏”^{⑦4}。比如著名僧人康法藏在武则天时期曾受命在洛阳翻译《华严经》,在洛阳创立佛教宗派华严宗,并被尊为华严宗三祖。玄宗时的嵩禅师(曹彦瓌之父)门徒众多,说法时“缁徒骈立,卑身而伏,耸耳而听”^{⑦5}。广福寺在大历年间有僧人康守忠^{⑦6}。许多人华粟特人开始信仰已经中国化的佛教^{⑦7},洛阳粟特人墓志反映了部分粟特人对佛教的皈依。如安静“深该六度,妙蕴四禅”^{⑦8}。开元四年《安思节墓志》载安思节“心归妙业,结意芳缘,护法终身,持戒没齿”^{⑦9}。天

宝十载(751)《安思温墓志》载安思温“儒释二门,特加精意”^⑧。贞元十八年(802)《何澄墓志》载何澄“悟色空之繁想,修彼岸之真宗。睹白月以清心,慕青莲而擢质”^⑨。

还有大量艺伎、奴仆等社会下层人员。奴婢是粟特商人经营的商品之一,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文买婢契《鞠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施罗等请过所案卷》等就是明证。粟特商人在来到洛阳经商的同时,也将一些少数民族婢女卖给洛阳的酒家。^⑩洛阳唐墓中常见高鼻深目、神情恭顺的胡俑便是佐证。有的胡俑手执乐器做演奏状,有的做牵马或牵驼状,有的驾驭牛车,显然都是从事歌舞表演、牵马拉车等工作。石刻资料则见于一座唐代石雕塔上的开元三年题记:“家人石野那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给(级)浮图一区为记。”^⑪野那是当时粟特人的常用名,意为“最喜欢的人”^⑫,题记中出现的石野那很可能是一个粟特奴仆。

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居住相对分散,但在南市周边却相对集中。洛阳出土墓志显示墓主生前居住在南市旗亭里的有安公康夫人^⑬。南市正南的嘉善坊、东侧的章善坊、西侧的思顺坊都是唐代粟特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已知居住在嘉善坊的有8家,如安师及妻康氏、史夫人、安神俨、曹公及妻康氏、何澄及其妻等;居住在章善坊的有5家;居住在思顺坊的有4家,如高宗、武后时粟特人康达、安怀、康智及建中二年(781)陀罗尼经幢幢主何氏等。^⑭南市西南的修缮坊也住着较多粟特人,如安公和夫人康胜、花献妻安氏夫人等。墓志所见洛阳粟特人分散居住在14个里坊之中^⑮,比如高宗后期任诸卫将军的安元寿住在乐城里^⑯,武后时的太常乐工安金藏居住在惠和坊,玄宗时的太常乐工曹干琳晚年居住在陶化里。^⑰南市周边由于居住粟特移民较多,遂成为洛阳最具域外色彩的地区。

粟特本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祆教,祆祠的存在是粟特人聚居的表征之一。唐初,立德坊及南市西坊、会节坊皆有胡祆神庙,且经常举行宗教活动。“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⑱唐代粟特商队中流行的骆驼祆神形象在洛阳也屡有出土。三彩骆驼俑驼鞍中的祆神形象与山西介休祆神楼“神驼”木雕有很多相似性,反映了粟特人的“祆

教信仰和以马驼‘皮袋’祀祆的风习”^⑲。入华粟特人的信仰呈现出多元的特点,本土的祆教、中国化的佛教之外,还信仰景教。^⑳南市附近的修善坊有景教大秦寺。洛阳出土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根据幢记可知直到唐后期8至9世纪,洛阳大秦寺的景教僧人和信徒中还有粟特人,并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都是粟特人。^㉑

四、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汉化的表现及原因

洛阳粟特移民最终融入了汉族,具体表现在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终与汉族无异。

不同民族间的广泛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唐代入华粟特人的通婚状况以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为界前后有显著变化。安史之乱前很好地保持着本民族内部以及与其地缘联系非常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习惯。安史之乱后本民族内部通婚明显减少,几乎不见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与汉族通婚的现象则显著增加。^㉒粟特人内部通婚以史隋家族为例,史隋的三个孙女分别嫁给了康公、安怀、康老师,四方墓志^㉓先后在洛阳出土,年代最晚的是武周长寿二年(693)《安怀墓志》。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例子见有粟特人与吐火罗人罗氏、酒泉单王之后唐氏等。安史之乱后洛阳粟特人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显著增加,比如曹干琳娶彭城刘氏为妻,其父母时还是粟特人内部的曹、何联姻。已知的与汉族通婚的8例中有6例出现在这一时期。^㉔

丧葬习俗的汉化是入华粟特人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从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中原之土葬转变、流行墓志铭和夫妻合葬、存在家族墓地并流行归葬先茔以及丧礼表现形式的转变等诸多方面。^㉕这些变化也都表现在洛阳的粟特人墓葬中。此外,洛阳粟特移民在丧葬区域的选择上也深受时人影响。人们早就公认洛阳北邙山是冥土安魂的风水宝地,至唐代更是“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㉖。洛阳粟特移民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如调露元年罗甄生与夫人康氏“合葬于河南界北邙,礼也”^㉗。又如开元十一年康威“夫妻合葬,附于先祖父茔,定鼎门正北廿五里河南北山,礼也”^㉘。据统计,北邙山出土的粟特人墓志多达43方。^㉙

文化认同是区分人群的重要因素,文化较血统

代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⑳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55年，第3995页。㉑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㉒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㉓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70—479页。㉔④⑤⑦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1582、1596—1598页。㉕颜真卿：《康金吾神道碑》，《全唐文》卷三四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3474页。㉖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㉗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209页。㉘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2页。㉙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772页。㉚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㉛姜伯勤：《论宋元明时期山西介休的袄神楼》《山西介休袄神楼古建筑装饰的图像学考察》，《中国袄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71—284、285—294页。㉜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49页。㉝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20页。㉞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卷四十六，希古楼本，第14—16页。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第273、739页。㊱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1—572页。㊲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博》1997年第1期。㊳乔栋、李献奇、史家珍：《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㊴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㊵张丽明：《河南洛阳市龙门北市香行像窟的考察》，《考古》2002年第5期。㊶陈海涛：《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季刊》2001年第2期。㊷仆罗：《诉授官不当上书》，《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55页。㊸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博》1997年第1期。㊹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5、503、694、694—695、658页。㊺⑩⑪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㊻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4页。㊼圆照：《代宗朝赠司

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卷五十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影印本，第835页。㊽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2页。㊾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4、1180页。㊿林默林：《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雁塔》，《文物》2001年第6期。㉁葛承雍：《曹野那姬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王振国：《洛阳经幢研究》，《龙门石窟与洛阳佛教文化》，中古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128页。㉃张鹭：《朝野僉载》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64—65页。㉄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袄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袄神崇拜》，《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页。㉅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9—56页。㉆罗照：《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㉈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8、335、845页；乔栋、李献奇、史家珍：《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㉉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第3期。㊱王建：《北邙行》，《全唐诗》卷二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3375页。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页。㊳刘惠琴、陈海涛：《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3年，第145—153页。㊴邵明杰：《论入华粟特人流向的完整线索及最终归宿——基于粟特人“回鹘化”所作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㊵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119页。

责任编辑：王轲

The Analysis of Sogdians in Luoyang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ng Yuxia

Abstrac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Sogdians in Luoyang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y were either descendants of the Sogdians who had entered China from the Han to Sui Dynasty, or Sogdians who had entered China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main reason for Sogdians arriving in Luoyang was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addition to businessmen, there were officials (mainly military officers), monks and servants among the Sogdians in Luoyang. Sogdians scattered across Luoyang, but comparatively they concentr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near the southern part. After the Mid Tang Dynasty, they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Han nationality,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marriage, funeral customs,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eventually had no difference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Key word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uoyang; Sogdians